

彙刊 研究 詩歌 古典



明
程

第十八輯 第六冊

宋詞論集(上)

謝桃坊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八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6 冊

宋詞論集（上）

謝桃坊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詞論集（上）／謝桃坊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序 8+ 目 2+224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八輯：第 6 冊）

ISBN 978-986-404-298-2（精裝）

1. 宋詞 2. 詞論

820.91

104014041

ISBN- 978-986-404-298-2



9 789864 042982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八輯 第六冊

ISBN：978-986-404-298-2

宋詞論集（上）

作 者 謝桃坊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307088 字

定 價 第十八輯 13 冊（精裝）新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宋詞論集(上)

謝桃坊 著

作者簡介

謝桃坊，一九三五年生，四川成都人。一九六〇年畢業於西南師範學院中國語文系。一九八一年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工作，現為研究員。著有《柳永》、《蘇軾詩研究》、《宋詞概論》、《中國詞學史》、《詞學辨》、《宋詞辨》、《中國市民學文史》、《敦煌文化尋繹》、《唐宋詞譜校正》、《詩詞格律教程》、《四川國學小史》、《國學論集》等。

提 要

本集收錄作者近三十餘年來關於宋詞研究之論文三十五篇，可分為理論探討、史實考證和作家評論三大部分。宋詞理論方面有關於宋人詞體起源說的檢討，宋人詞體觀念形成之文化條件的分析、詞為艷科的辨說、宋詞音樂文學性質的論述、宋詞藝術特徵的探究、宋詞流派問題的商兌、南宋雅詞和江西詞派的辨正。宋詞史實方面有關於宋代歌妓和詞的演唱情況、朱敦儒詞韻、魏了翁詞編年及柳永、姜夔、吳文英和張炎等事蹟的考證。宋代詞人方面有關於晏殊、柳永、蘇軾、周邦彥、辛棄疾、朱熹、魏了翁、吳文英和張炎的評論。作者堅持詞為艷科、詞為音樂文學和宋詞無流派之說，提倡「律詞」觀念以切實把握詞體文學的特性；在方法上採用理論的歷史的研究，同時採用科學考證方法，因而學術個性突出，在詞學界頗有影響。此集涉及了宋詞研究中系列重要的學術問題，較能代表作者研究宋詞的成就，亦可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學研究思潮。

自序

我治宋詞從發生興趣、立志到從事專業研究工作，有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今此集的問世，應是我研究宋詞具有總結性的意義，此後還有一些論文，但已是緒餘了。

1935年夏曆六月十三日，我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外東牛市口（得勝場）上水巷42號後宅。母親說在臨產前夢見有人送給一個水蜜桃，父親是火命，與木相生，遂以「桃」給我命名。我自幼體弱多病，十三歲時小學畢業後身體才漸漸好起來。在讀小學時，成績很平常，最後一學期始名列甲等之末。我報考成都縣立中學，考試完全失敗，父親不加以責備，於1948年秋送我到場外讀私塾。劉杲新先生字少農，早年曾為某軍幕僚，接受過維新思想，極佩服梁任公，於西蜀則服膺趙堯生。先生晚年自耕田八畝，教數名學童。先生以學識深厚與楷書大字知名鄉里。平常先生在街上行走總是穿著舊的長袍，低著頭似在沉思，拖著沉重的腳步，顯然是落魄的文人。父親與先生相識，故我在私塾讀書時先生特別關愛。我讀廣益書局銅版《四書集注》，先生教我閱讀朱熹的注釋，偶爾講一兩段文字，不要求我背誦。半年我學完了《四書集注》，遂泛讀《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莊子》、《左傳》、《周易》。我想讀到一本能夠指導社會人生的書，但總是失望。先生嘆息說只要精通一本書就行了，然而我卻並不滿足。先生的書架

上僅有三部書：《古今說部叢書》、《香艷叢書》和《清代八賢手札》。我讀了它們，擴大了知識範圍，產生了讀書的興趣。1949 年秋我在成都春熙路地攤上購得一部漱石齋精印的《草堂詩餘》，反復誦讀，極喜愛唐宋詞之優美典雅，又從先生學習了詩律。臧新先生開啓了我的智慧，引導我進入了廣闊的知識領域，是我最敬重的師尊。自此我將世俗的東西看得很輕，渴求知識，並產生了一種朦朧的高遠的學術追求。1950 年因社會政治的巨大變革，我家經營的小小的糕點店難以維持全家生計，父親決定全家遷回成都外北八里莊老家務農，自耕農田五畝六分。父親屬於舊社會的人，又因年老體弱，不能做農活。我已十五歲了，自覺負起家庭的責任，遂學習農活，又開荒種地，母親勤勞地操持家務。我家屬華陽縣保和鄉農民協會第七分會，因我被認為是文化較高的青年，遂應邀到農會工作，初任青年組組長，繼任文教委員。1951 年初夏保和鄉劃入成都市，我在農會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1952 年秋正式參加成都市工農業餘教育工作，為專任教員；1954 年秋轉到成都郊區第三中心小學工作，擔任語文和歷史課程。這段時期我吸收新文化知識，參加政治學習，同時自修文藝理論、史學、邏輯學和哲學，文化水平不斷提高。1956 年我獲准可以報考高等學校，遂以同等學力考入重慶西南師範學院中國語文系。學院師資力量雄厚，李景白先生講先秦文學，荀運昌先生講漢魏南北朝文學，徐無聞先生講唐代文學，林昭德先生講宋元文學，劉繼華先生講現代漢語語音，林序達先生講現代漢語語法，徐德庵先生講古漢語，潘仁齋先生講文學概論，吳宓先生講外國文學，劉兆吉先生講心理學。課堂學習使我獲得了系統的中國語文的基礎知識，但我主要致力於自學西方哲學、史學、美學、文藝理論、中外交通史、中國思想史，文獻學、詩律學等，以期建立廣博的知識結構，以為將來從事文藝批評奠定理論基礎。然而 1957 年 7 月，我的人生道路發生了改變，遭遇到重大的政治打擊，因情節較輕，態度較好，仍留校學習，但受到監督。我原來的純樸而幼稚信仰為無情的現實粉碎了，而從事文藝批評的志

願會變得荒唐而可笑了。在經困苦的反思之後於 1959 年初力求選擇一個適合我學術興趣的專業，走上純學術的道路。時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趙幼文先生來信提到我對宋詞的喜愛，我當即決定研治宋詞，大量搜集資料，嘗試進入研究境地。1960 年秋畢業，發配到四川省廣漢縣中學當雜工，1963 年回到成都郊區老家務農，仍受監督。1977 年 12 月 28 日，始被宣告「改正」結束了二十年苦難屈辱的生活。人生二十二歲至四十二歲正是奮進與創業的黃金歲月，而它於我則是一場災難與噩夢。我悼惜我青春的年華，它像死在青條上未開的花。1978 年秋我到成都聖燈中學代課，1979 年春重新正式工作。1980 年夏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試，以助理研究員被錄取，1981 年初春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為宋詞。我終於在人生旅程中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社會定位，可去實現研究宋詞的夙願了。

在進入四川社科院之初，科研工作和學術界於我皆是陌生的，然而憑理性的指導，我在研究所裏採取守愚藏拙的態度，不加入任何宗派，不與人合作，不參加集體科研項目，保持獨立與自由，沉潛地去逐鹿中原。我讀過許多專門的學術論著，知道論文的寫作必須有新材料、新觀點、新方法和新課題，而且要有一定的學術深度，力求解決一個學術問題。關於研究方法，我曾讀過德國現代經濟史家偉·桑巴特的《現代資本主義》，他提倡的理論的歷史的方法為我所接受，這樣可從歷史事實的考察進入理性的思辨，使論述的問題上昇到理論的高度，將經驗與理論結合起來。我的第一篇論文《宋代民間詞論略》發表於《貴州社會科學》1981 年第 3 期，迅即為《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轉載。1983 年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略談夢窗詞與我國傳統創作方法》，在《中華文史論叢》發表《宋代歌妓考略》，又在《文學遺產》季刊發表《張炎詞論略》，以及其他三篇論文，遂在學術界產生影響，突然成名。此後，上海古籍出版社約寫《柳永》小冊子，巴蜀書社約編《柳永詞賞析集》，上海辭書社約請為《唐宋

詞鑒賞辭典》寫宋詞賞析小文多篇。本來我是計劃系統地研究宋詞，寫一部宋詞史的，獲知已有詞學界友人在寫，遂準備重點研究對宋詞發展最有影響的詞人而完成一部宋代名家詞研究的著作，這樣可以避免史的一般性的論述，而真正進入研究的領域。我選擇了宋代十二家詞人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他們是晏殊、柳永、歐陽修、蘇軾、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姜夔、劉克莊、吳文英、王沂孫、張炎。其中對柳永、吳文英和張炎的研究較為全面，也真正較為深入。我們對古典作家的研究，必須要找到所存在的學術問題；它不是單純從喜愛或興趣而發現的，而與個人的學術判斷有關。我雖然很喜愛李煜、晏幾道、蘇軾、秦觀、辛棄疾的詞，卻難以發現學術問題，始終找不到學術的切入點。關於宋代名家詞研究的最後成果為《宋詞概論》，它分為三編：上編宋詞的發展過程，中編論北宋名家詞，下篇論南宋名家詞。此著完成於1987年，於1992年由四川文藝出版社版。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受到庸俗社會學觀點與方法的制約，簡單粗暴地否定與批判傳統文化成為時代的傾向，宋詞的研究因而極為冷落，尤其是對婉約詞是給予否定的。新歷史時期的來臨，學術界清算了庸俗社會學的流毒，撥亂反正，思想活躍，而對傳統文化亦重新審視和評價。我正是在此文化背景下探討宋代名家詞的，表現出對婉約詞的新的認識，適應了詞學研究的新的發展趨勢，所以現在回顧我這一時期的論著，它們仍有生命力的。

當《宋詞概論》完稿之後，宋詞研究暫告一段落，我需要調整研究方向。八十年代是宋詞作家作品研究的興盛時期，我預測詞學理論的研究將很快受到關注。《文學遺產》編輯部則估計文學史的寫作將在九十年代出現高潮，因此我決心迅即寫一部中國詞學史。這個課題是屬開拓性研究的，因我於文藝理論有些修養，亦有對詞學較為全面的認識，故寫作的進展很快，從1978年開始，至1979年底如期完成《中國詞學史》。它於1993年由巴蜀書社出版，2012年修訂出版，2015年改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著雖然粗疏，但對一些詞學問

題作了重點探討，發表了系列論文，初步建構了詞學史的體系。它不同於僅關注詞學思想的詞學批評史，而是對詞論、詞籍、詞韻、詞律、詞學文獻的歷史過程的全面的論述。關於現代詞學的述評是很難處理的，我在概略述及眾多詞學家後，從新文化的觀點和詞學學科的意義著重評述了胡適、胡雲翼、龍榆生、夏承燾、唐圭璋五位詞學家，客觀地闡明他們在現代詞學發展中的貢獻，以反映詞學發展的全過程。故此著以具有全面、簡略、樸素和開創的特點而為詞學界所關注。以胡雲翼作為現代詞學的重要詞學家在詞學界是存在爭議的，但我認為他是現代最早以新文化的觀點和現代白話的表述方式來研究詞學的，建立了詞學體系和詞史體系，在現代詞學的發展中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和積極的作用，這是應給予充分肯定的。胡雲翼對詞學理論的傑出貢獻是認為詞是音樂文學，詞為艷科，堅持宋詞無流派之說。我完全贊同胡雲翼理論，並在完成《中國詞學史》之後予以進一步的探究和闡發。友人洛地是戲曲史家，對中國古代音樂有精深的研究，而於詞學亦有獨特的見解。他提出「律詞」的觀念，即認為詞體是講究格律的，每調自成格律，以之區別於其他的各體韻文。他論詞的許多意見與我和詞學界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其「律詞」觀念則為我完全接受，雖然我們在具體理解上尚存在差異。我持「律詞」的觀念，探討了系列的詞學問題，並認為這是現代詞學理論的重大突破。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論文集《宋詞辨》，2007年繼由該出版第二部論文集《詞學辨》，其中收入的關於詞學問題的探討即是在1990年至2006年之間完成的。

在《詞學辨》裏已收入關於詞調分體，詞調分類，詞韻、詞譜、詞與聲詩等詞體問題的探討。詞體研究是困難而繁瑣的，也是現代詞學研究中最薄弱的，我有濃厚的興趣做此項工作，希望在解決系列的理論問題之後，按照我對詞體的認識而編一部新的詞譜以代替清代萬樹的《詞律》和王奕清等的《詞譜》。2008年發表的《詞譜檢論》概括了我重新編著詞譜的原則與體例。2010年試編的《唐宋词譜粹編》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編收入詞調兩百個，適於一般喜好填詞者使用。我擬在此基礎上擴展爲完備的詞譜，遂對唐宋詞調進行普查，將聲詩、元曲及宋以後新創之調清除，於 2012 年發表《唐宋詞調考實》，經核實唐五代一一五調，其中爲宋人沿用者八一調；宋詞共八一七調，除去沿用唐五代者，實爲七三六調；唐宋詞共有八五一調。此年我編著的《唐宋詞譜校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譜計收四九七調，突出律詞觀念，突出文學性，加強學術性。我期望由詞體規範的重新建立以推動詞學的進展。本來我擬編一部完備的詞譜的，因缺乏必要的外部條件，亦因個人精力不濟而只得從簡了，留此遺憾，以俟高明。

從研究宋詞，進而探討詞學史，最後完成詞譜的編訂，這過程中實現了我志於研究宋詞的初衷。回顧自 1959 年立志從事純學術研究，今已倏忽五十餘年了。每一位學者怎樣選擇學科，採取什麼觀念和方法去研究，怎樣切入學術問題，怎樣取得學術的突破，怎樣去逐步實現學術理想，這些皆與時代思潮、文化條件和個人的學術興趣、知識結構、性格、信念、生命的適應能力等因素相關。我之所以選擇詞學，因對宋詞特別喜愛，它既可以寄託與表達性靈，亦可滿足理性的追求，甚至可以臻於高遠的學術與思想的境界。如果說我在詞學研究中取得一些成就，而且二十年的苦難生活未摧毀我的意志，則是由於對學術信念的堅守，並保持著對學術獨立與自由的追求。當我回首往事時雖有不少的遺憾，仍可感到造化的公平，亦足欣慰了。

蜀中前輩學者廖平的治學歷程凡六變，我反思自己的治學歷程則大致七年一變，每一變實爲學術研究的調整。當完成自設的某一重大課題之後，甚感精疲力竭，需要休息，尤需要根據學術發展的趨勢以確定下一步前進的方向。此際我總是採取學術領域的轉移，以滿足追新務奇的心理，由此而產生新的感覺與活力。這樣遂在我研治詞學的過程中產生了幾隻插曲：《蘇軾詩研究》、《敦煌文化尋繹》、《成都東山的客家人》、《成都沙河客家的變遷》和《中國市民文學史》。近年

最大的學術轉移始於 2006 年《詞學辨》即將出版之際，時值國學熱潮再度在中國興起，我迅即以主要精力投入。我從考察國學運動的歷史切入，對國學重新定義，仍採取理論的歷史的方法，更傾向於科學考證方法，發表了系列論文，於 2009 年出版《四川國學小史》，於 2011 年出版《國學論集》。我於國學研究的道路將愈益寬廣，而詞學研究亦將以餘力繼續下去。我的詞學界老友，有的已經封筆了，有的亦呈現創造力貧乏之現象。我現在尚能保持學術的活力，乃由於適當的學術領域轉移所致，這樣纔可能避免江郎才盡的不幸。

在五十餘年前，當我志於研究宋詞之時，即盼望能出版一部論文集，今《宋詞論集》的結集，它基本上可以體現我研究宋詞的主要成果。敬祈詞學界師友與讀者的教正。

謝桃坊

2015 年 1 月 11 日於爽齋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宋人詞體起源說檢討	1
宋人詞體觀念形成的文化條件	19
詞為艷科辨	33
宋代歌妓考略	47
宋詞演唱考略	63
宋詞的音樂文學性質	79
論宋詞之詞調與宮調的關係	95
論宋詞的藝術特徵	111
宋詞流派及風格問題商兌	127
《高麗史·樂志》所存宋詞考辨	141
南宋雅詞辨原	157

南宋朱敦儒詞韻考實	171
江西詞派辨	185
北宋倚聲家之初祖晏殊	201
柳永的俗詞與雅詞	215
柳永事跡補考二題	219
下 冊	
歐陽修詞集考	225
歐陽修獄事考	239
蘇軾開始作詞的動機辨析	253
周邦彥詞的政治寓意辨析	267
李師師遺事考辨	277
辛棄疾以文為詞的社會文化背景	291
姜夔事跡考辨	303
朱熹之詞體觀念與詞作	315
魏了翁詞編年考	327
論魏了翁詞	345
略談夢窗詞與我國傳統創作方法	357
試論夢窗詞的藝術特徵	361
論夢窗詞的社會意義	373
吳文英事跡考辨	385
吳文英去姬事辨	395
談張炎對夢窗詞的批評	401
張炎詞集辨正	405
張炎詞論略	419
張炎等遺民的時代歸屬問題	435
附錄：詞學論著繫年	439

宋人詞體起源說檢討

詞體起源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學術問題。本世紀以來，它引起了許多學者和詞學家的興趣，自 1901 年至 1992 年的九十年間發表的專門論文共有二百三十餘篇〔註 1〕。這些論文使用了新發現的敦煌曲子詞資料，從不同的視角進行探討，作出了很有學術價值的論斷；但是由於此問題涉及學術層面較廣、歷史線索錯綜迷亂和詞樂資料散佚以致迄今尚未完全地解決，而又遺下一些新的學術問題。現在，詞體起源仍是詞學界所關注的懸案之一。茲試從一個側面來進行探討，即具體考察宋人關於詞體起源的論述，或許可給我們以有益的啓迪。詞體在宋代處於繁榮興盛時期，被譽為時代文學；詞學亦隨即興起。宋人距詞體起源時間最近，富於倚聲填詞的經驗，能見到一些最為珍貴的詞樂文獻資料，可以感知詞體初期發展階段；所以在他們關於詞體起源的討論之中，必定存在某些較為合理的和較接近歷史真實的意見。他們的意見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而加以認真檢討。

一

在唐代隨著新的流行音樂而產生的一種音樂文學樣式，唐人稱它為「曲子」、「詞」或「歌詞」，對其性質與形式，尚缺乏清楚的認

〔註 1〕 參見林玫儀主編：《詞學論著總目》第一冊，第 30～46 頁，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5 年出版。

識。五代後蜀廣政三年（940）歐陽炯爲詞總集《花間集》作序時，他對詞體的認識亦停留在具象的階段，而且僅注意文學風格的淵源關係。詞體經過晚唐五代的發展，至宋代臻於成熟，其性質與形式特點已趨顯著，因而宋人關於詞體已有了確切的理性認識。在宋人看來，新興的詞體與古樂府辭、近體詩、聲詩、雜言詩等是有嚴格區別的，而有其自身特殊的規定性。

宋人將詞體的形式特點概括爲「長短句」，並以之作爲詞體的代稱。不少詞人還將自己的詞集題名爲「長短句」，如秦觀的《淮海居士長短句》、米芾的《寶晉長短句》、張綱的《華陽長短句》、胡銓的《淡庵長短句》、張孝祥的《于湖先生長短句》、辛棄疾的《稼軒長短句》、魏了翁的《鶴山先生長短句》等。當然，宋人也稱詞體爲「歌曲」、「樂府」、「樂章」等，但當他們論及詞體與其他諸種詩體之區別時，特賦予「長短句」概念。例如：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耳，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存，明皇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幸蜀，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絕句詩。今不復有歌詩者，淫聲日盛，閭巷猥褻之談，肆言於內，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爲非，可怪也。（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

韓退之云「餘事作詩人」，未可以爲篤論也。東坡謂詞曲爲詩之苗裔，其言良是。然今之長短句，比之古樂府歌詞，雖云同出於詩，而祖風已掃地矣。（朱弁《月風堂詩話》卷上）

朱翌和朱弁俱是北宋後期思想保守的文人，他們對詞體並無好感，以爲它乖離了儒家政治教化的文學主張，因而是持以否定的態度。這裏應注意他們的兩個觀念：一是「古無長短句」；二是「今之長短句」。按通常的概念，「長短句」與「雜言」是等同的，它是在一首詩裏出現了長短不齊的三、五、七，或四、六、九的句式並非單純

的四言、五言或七言。中國古代的《詩經》、漢魏樂府歌辭皆有雜言體。詞體在形式上與雜言體相似，宋人特稱為「長短句」其意在於使它與雜言區別開來。「今之長短句」與古代雜言歌辭，它們同屬音樂文學，但卻存在實質的區別，並非同一文學樣式。宋人爲強調這種區別，還認為詞體是中國詩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變體」。南宋詞人張鑑說：

《關雎》而下三百篇，當時之歌詞也。聖師刪以爲《經》，後世播詩章於樂府，被之金石管弦。屈、宋、班、馬繇是乎出。而自變體以來，司花傍輦之嘲，沈香亭北之咏，至於人主相友善，則世之文人才士，遊戲筆墨於長短句，間有能瑰奇警邁，清新閑婉，不流於蕩污淫者，未易以小技言也。（《題梅溪詞》，《宋六十名家詞》）

宋人以爲此「長短句」同以往的音樂文學或格律詩體比較而言，它是新的「變體」。其所謂「自變體以來」，即指自詞體產生以來，它是中國文學史上特定歷史階段出現的文學現象。因此，關於詞體文學淵源的問題，後世詞學家的源於《詩經》說，源於漢魏六朝樂府說，源於古代長短句說，等等，皆是對詞體之獨立意義和文學性質缺乏歷史考察而得出的片面的與膚淺的結論。

唐代安史之亂後，崔令欽於寶應元年（762）著的《教坊記》記述了唐代開元天寶時期朝廷教坊之建置及歌妓軼事。其中保存了教坊所用之「曲名」三百二十四曲，這是非常重要的早期詞學文獻。唐代兩京（長安與洛陽）教坊的建置是爲了滿足宮廷對於流行俗樂的需要，而聚集了歌舞藝人以教習。教坊曲裏的絕大多數曲名皆成爲後來常用的詞調，例如《清平樂》、《破陣曲》、《浣溪沙》、《浪淘沙》、《望江南》、《鳳歸雲》、《離別難》、《拜新月》、《大酺樂》、《伊州》、《甘州》、《采桑》、《雨霖鈴》等。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崔令欽當時未記下一首教坊曲辭，致使學者們對教坊曲的文學形式難以判斷，亦使詞體起源的線索迷亂了。唐代聲詩至今存一千五百餘首，都是齊言體的歌詞；